

探寻经济热点难点问题背后的逻辑

刘迎秋

思想人生②

我从事经济理论研究,是从执笔完成并公开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开始的。一个历史性机遇是1979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18个城市开展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改革试点。我抓住这个难得机会,挤时间进社会、到工厂开展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调查与研究。调研中发现,不仅社会上一些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存在疑问,理论界的争论也很激烈。调查启发思考,研究激活思想。结合调研取得的思想收获,在深入分析比较各种不同观点的基础上,我执笔完成并于1980年初发表了《试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一文。文章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论述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结合起来,在明确提出“要搞清楚我国现阶段社会性质这个问题,还必须从分析我国现阶段的经济、政治的基本结构入手”基础上,较早分析论证并得出了“在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过渡时期已结束。现阶段已经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论。这篇理论文章,是我从事经济热点、难点问题研究的首次尝试。它作为我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处女作,对后来搞好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和深化理论研究,均发挥了视角选择、思路拓展、观点创新的重要作用。

此后,开展经济社会调查、探索经济热点难点问题的发生发展及其逻辑与规律,便成了我的不懈追求。例如,在认真研读马克思原著、做好政治经济学本科教学和查阅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社会调查基础上,我抓住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大批知识青年返城与城市就业岗位有限这个热点难点问题,通过分析、论证,执笔完成了长篇论文《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此文从当时“整个经济生活还不能离开个体经济”这个基本现实出发,通过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消灭个体经济的教训和粉碎“四人帮”后重新恢复发展个体经济产生的积极效果,突破“资本主义尾巴论”的束缚,以“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多层次结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生产水平不高,还远不能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还要求有其他形式的经营做补充”为基本立论依据,分析和阐明了个体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必然性以及要“保护和促进个体经济”的逻辑结论和政策主张。文章于1981年初公开发表后,很快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发挥了理论源于实践、推进实践的积极作用,在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产生了较大影响。

二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增长连续两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为应对经济下行的挑战、推动和深化改革开放,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深化改革,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扩大开放,目标是融入世界经济;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要形成更高社会生产力。在此背景下,在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导下,围绕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更大发

展这个热点难点问题,我于1993年初撰写完成了《中国经济“民营化”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分析》一文。该文从我国现阶段发展民营经济具有能够适应老百姓物质利益诉求、有助于深度发掘老百姓创新发展潜能的角度,首先解析指出“‘民营’是一个与‘官营’相对的概念。‘民营’的实质在于‘非政府’、‘非官方’直接插手的自主经营”,即后来人们常说的“老百姓经济”;进而在纵向历史对比、横向实证分析基础上,得出了“国民经济的‘民营化’既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基础,又是符合我国生产力发展内在要求的必然的和正确的选择”的逻辑结论,论证阐明了“国民经济的‘民营化’,并不否定一定范围的‘国有官营’或‘官办官营’,对于那些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需求弹性较小且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生产经营项目来说,我们不仅要继续实行‘国有官营’‘官办官营’,而且还要设法把它经营得更好,使其给社会和国民带来的经济效益更大”等重要理论观点。该文初稿完成后,首先提交全国工商联在海南主办的“中国私营经济九十年代发展方向与政策研讨会”进行研讨,然后又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举办的午餐会上开展专题讨论,在充分吸收各方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进行再修改、再完善,最后公开发表在《经济研究》1994年第6期上。文章发表后,受到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的广泛重视,有关文献资料作了全文转载或摘编。

时间很快到了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夕。1997年8月初的一天,《光明日报》编辑部打来电话,约我尽快撰写一篇有关股份合作的理论文章。我即刻着手分析研究,次日便提交了一篇2000字的理论短文《漫谈股份制》并于1997年8月4日报见。大体是在同一天,我还接到《经济参考报》的约稿电话。按约定,我又抓紧撰写并及时递交了一篇长达3000字的理论文章《股份制:公有财产的有效实现形式》,并于同年8月5日公开见报。两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深入浅出地分析和说明了股份合作和股份制及其与公有、私有的关系,阐明了股份公司的性质及其对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为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提供了必要舆论支持。

党的十六大首次将“两个毫不动摇”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发展目标。围绕“两个毫不动摇”和新世纪新阶段如何大幅度提升民营企业竞争力的问题,我组织并带领中国社科院与有关高校老师和研究生,通过与当时的浙江省工商局合作、请其他有关省市工商局配合,分别以企业综合素质、品牌、自主创新、人力资本、走出去、转型升级等六大指标与民营企业竞争力的关系为主题,连续8年开展了中国民营企业竞争力问卷随机抽样调查和企业实地考察。在主编完成并陆续出版主题互联、内容又各不相同的6部《中国民营企业竞争力报告》(No.1~No.6)蓝皮书的基础上,先后召开6届全国领导人、中国社科院和浙江省省委省政府领导出席,数千家民营企业参加

的“中国民营企业峰会”。每部研究报告的出版和每届峰会的召开,都对浙江乃至全国民营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及其健康发展发挥了有效引领和积极促进作用。其间,我还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最终成果《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新论》。这项近70万字的研究成果于2011年正式出版后即入选第二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还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弱化甚至否定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种错误思潮和言论多次发表讲话,充分肯定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重申党中央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强调“民营企业是民营企业是我们自己人”,并要求切实搞好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建设等。这些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文件的发布,不仅坚定了我从事并着力做好民营经济发展热点难点问题研究的决心和信心,而且为我进一步深化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研究调准了定盘星,把稳了方向盘。坚持并努力做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也因此成为我生命中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责任和义务。

三

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科学。我热爱经济学并坚持做到经济理论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服务。

为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科学回答和有效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我着力围绕中国经济平稳运行与宏观调控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基础理论和政策研究。研究过程中,我不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做到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中归纳总结、厘清本质、揭示规律,而且坚持运用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等现代经济学方法,进行理论抽象、实证分析和观点阐释,做到了成果前瞻有效。例如,在长期进行调查研究和理论揭示基础上,我先后分析、论证、设计,阐明了一套可供政府管理部门和企业乃至个人进行经济走势预判和决策实操参考的宏观调控参数体系,主要包括适度经济增长率、货币供给增长倍数、政府债务率与合理赤字率、固定资产投资合理增长率、合理消费增长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及其与物价指数协同效应等九大类调控参数。这套宏观调控参数体系的论证和阐释,不仅得到同行的认同,还先后得到时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魏礼群教授的充分肯定和时任中宣部副部长雒树刚同志的特别重视,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则专发一期《成果要报》(2003年第3期)直报党中央、国务院,发挥了理论源于实践、服务实践的作用。此项研究成果全部收入《次高速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一书后,于2004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五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三等奖”。

40多年来,围绕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我先后在中国社科院《要报》(内部)和《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数百篇研究成果,起到了深化理论研究、服务社会实践、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在这些成果中,除自选或上级交办的研究项目和课题外,我还先后主持完成了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和国家重大研究项目等多项调查研究工作。其中,受中国社科院党组委派,作为专家组组长和课题组组长,我于2005年6月至2007年1月主持完成了浙江省与中国社科院开展的省院合作重点课题《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在浙江》的框架设计、调查研究、总报告撰写和一套共六册的调研成果的公开出版等工作。成果完成并出版后,得到时任浙江省委领导的高度认可和充分肯定,产生了广泛影响。该成果于2014年荣获“第八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特别奖”。浙江经验则成为推动全国各地经济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成功建设的典型样本和重要参照。

转眼我已退休十年有余。曾经在高校任教,后来又一直在中国社科院搞科研、带研究生的一名老教授、老研究员,我始终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认认真真搞科研带学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今后,我仍将笔耕不辍,继续努力在探索求解经济发展热点难点问题上下功夫出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名家小传



刘迎秋,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社科院首批二级),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93年10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级突出贡献专家。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协第四届中国经济社理事、第五届专家组成员,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等。主要研究领域:国民经济运行与发展、民营经济理论与实践。先后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和理论文章500多篇,独著和主编学术专著30余部,其中多篇(部)获国家和省部级优秀成果奖。



扫一扫 看视频

实践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出,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社保基金关系着医疗、养老、就业等各方面问题,影响着收入的再分配和社会互助共济,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管理运营好充实社保基金的股权资产,对于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具有重要意义。自2017年国务院实施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重大部署以来,浙江在全国率先完成全面划转,共划转全省157家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资本及权益总额1651.79亿元。

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省财务开发公司)作为浙江省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承接主体,以省政府资产管理操盘手为定位,探索建立起共富型社保股权管理模式,首创经验做法获财政部肯定并在全国推广,为全国社保股权管理工作提供了“浙江经验”。

首创社保股权综合发展指数,参与共富型统计监测体系构建。2021年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印发实施,提出“加快构建推动共同富裕的综合评价体系”。2022年2月举行的全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大会指出,要“探索建立共富型统计监测体系”。

省财务开发公司积极参与完善我省共富型统计监测体系,夯实数据基础,公司编制社保股权综合发展指数,在全国尚属首创。该指数系统以省财政厅报表系统收集的企业财务月报、年报及审计报告为数据支撑,选取32项关键财务指标搭建指标体系模型,从“企业成长能力”“企业盈利能力”“企业偿债能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能力”和“社保权益运营能力”5个视角开展分析,实现对社保股权资产的动态监测和风险把控,为共富型统计监测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数据支撑。

提升社保股权管理质效,助力共富型大社保体系建设。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探索构建共富型大社保体系,这为浙江推进新时期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通过管理好社保股权资产壮大全省社保基金,无疑是建设共富型大社保体系的重要一环。

省财务开发公司开展创新实践提升管理效能,力促社保股权资产保值增值。一是建立“数智化”平台,推进社保股权“精细化”管理。省财务开发公司自主设计、委托开发社保股权协同管理平台,接入工商、法律等各类相关数据,实现分红收缴、统计分析等业务功能,为决策提供实时数据支撑,实现对社保持股企业的动态精准管理。二是通过专业化资本运营,释放社保股权潜力。开展试点,对持续缩水的社保持股企业,探索通过股份回购、置换等方式退出,提升国有资本运营效率。三是以合规为底线,通过三种形式保证社保股权“不缩水”。出台相关制度,通过“现金补偿、提高社保股权比例、追加资产接收方股权”三种方案,保证公司享有的净资产账面值不减少,确保充实社保基金的资金不缩水。

建立社保股权管理标准化体系,推动共富体制机制创新。《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指出,率先基本建立推动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框架,促进共同富裕的财税、社保、转移支付、金融、土地等政策制度基本建立;强化政策制度创新,按照共同富裕导向,推动各领域各方面政策制度系统性变革。

省财务开发公司积极探索社保股权管理的模式与办法,形成一系列社保领域共富机制成果。一是建立社保股权管理的日常工作制度。社保股权管理关系着社保基金的未来发展,为共同富裕提供重要物质基础。省财务开发公司出台一系列充实社保基金国有资本的管理制度,明确权责边界和操作流程,建立社保股权管理的标准化体系。二是通过赋能社保系企业,形成帮扶山区26县新路径。省财务开发公司联合社保持股企业组建共同富裕基金,优先投资社保系企业的优质项目,推动相关企业发展壮大,同时引导社保系企业积极参与与山区26县省级开发区(园区)、山海协作园、特色生态产业平台建设,助力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三是推动建立社保股权承接技术联盟,形成社保股权管理行业标准。省财务开发公司加强与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和各省份社保股权承接主体的沟通联络,推动形成承接主体战略联盟,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机制,共建社保股权管理的行业标准,扩大共富建设“朋友圈”、搭建共富建设“连心桥”、打造共富建设“新引擎”。

【作者为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观点万花筒

未来五年的贸易战略须重新定位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的2023世界经济论坛上,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指出了影响全球经济增长趋缓的几个因素。第一,目前,全球生产效率下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各国的劳动生产效率增长速度实际上都在放缓。第二,部分国家“去风险”导致全球技术贸易下降,进而导致全球技术进步的增速比想象的要慢。“这最为明显的体现是全球芯片交易、半导体交易等高新技术交易额出现了剧烈的下降”。第三,全球在新技术应用场景和相应的扩展上,较疫情前有所放缓,最重要的体现是全球专利技术数量的下降。“这几大因素导致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效率比预期要差,是导致低增长的因素。”刘元春说。

刘元春还认为,一些关键性的长期因素也出现了变化,比如人口问题,产业链、供应链重构,逆全球化,减碳所带来的气候成本扩张,地缘政治风险所导致的各国对于防护安全问题、国防支出成本的上涨,这些因素都会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刘元春指出,2022年全球通货膨胀为9.2%,达到历史新高。“大家预测全球通货膨胀可能会从2022年的水平回落至5%左右。通货膨胀的回落,对于全球经济增长、对于低收入人群生活成本的降低当然是一个利好消息,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通胀的黏性依然是很强大的,要回到各个国家的目标值依然还有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刘元春说,比如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OECD(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等机构预测全球通胀要回归到疫情前的水平,实际上还需要一年的时间,“可以明确的是,全球处在一个去通胀、去高利率的新进程中”。

“目前美国通过的《两党基础设施法案》《通胀削减法案》以及《芯片和科学法案》等所带来的补贴还没有完全耗尽,这种补贴效应可能会对近两年内中国对美国、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长速度带来影响。”刘元春强调,随着这些政策补贴的消失,以及再工业化中的一些低成本降低的速度大大低于中国,可能会导致美国出现一些“烂尾工程”的现象。

刘元春认为,在贸易增速持续回落的过程中,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一定会产生阶段性的后果,这个阶段性的后果很可能是世界多体系进一步撕裂,世界贸易传统的潜能进一步削弱,从而产生在高成本中间的短期产业链、供应链新格局的出现。

“总体上来讲,是成本上升、规模下降、效益下降。未来五年,我国在贸易政策、贸易战略上需要全面重新定位、重新思考。”刘元春说,应对未来全球经济的变化,不仅要宏观角度,比如增长、通胀、利率政策、财政政策、债务、债务链、产业链、供应链的角度来思考,还要对持续政治僵局所带来的商业可行性和商业竞争模式变化进行深度思考,“这个思考是我们进行战略重新布局 and 深化的基础”。

“过去五年是全球供应链、价值链政治重构的阶段,未来五年一定是这个政治重构商业检验、竞争力检验的五年。”刘元春说。

“龙头企业+产业链农户”助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寿菊萍

之江青年论坛

推动“发展+环保+共富”。

一是选择高能级龙头企业组建园区并以公司化方式管理运行。新利公司成立于1992年,从事印刷商标用涂层和未涂层商标布的专业生产,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湖州市重点骨干企业,标准化生产的引领者。南浔区以新利公司为核心组建“新利共富园”,统一设计、统一口径、统一要求进行生产布局,实现了基础设施统一配备,电力设施、仓储设施、环保设施、后勤保障设施由园区统建统管,用能指标、单位能耗等由园区统一核算管理,污水排放由园区统一进行环保处理。因园区妥善解决了环保难题,可以吸纳散落在各村的家庭作坊式的喷水织机加工单位。大量的农户经营主体得以保存,且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实现了更有保障的发展。

二是由龙头企业牵头解决农户解决不了的研发、标准、资金、市场等问题。新利公司坚持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积极引进人才,开展技术合作与交流。近年来,累计投入约8000万元用于产业升级。目前,公司参与制定了5项国家标准,主导制定1项行业标准和1项浙江制造团体标准。公司通过开展培训传授劳动技能,引入标准化生产工艺和流程等,提高农户掌握运用新技术的能力,帮助农户逐渐实现标准化集约化生产。园区变压器通过定向分配,做到

“一户一电”,公司为支付用电费用。同时,采取无息垫资、资金补助的方式,鼓励支持农户进行设备更换,还给予设备更换设备每台每年2000元的补助,为期3年。为了带动农户经营,公司采取订单派发、委托生产、保底包销的方式,在稳定农户收益的基础上,持续做大蛋糕、分好蛋糕。截至2023年上半年,分派给园内零散喷水织机农户的加工费已达5000余万元。

三是由政府统筹解决企业解决不了的用地、用能、环保等问题。南浔区政府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做好政策激励约束和生产保障等工作。首先是建立约束机制。2022年以来,南浔区以环境整治为牵引,大力开展喷水织机行业提升行动,成立南浔区喷水织机行业整治提升领导小组,建立多部门协作监管和联动执法工作机制,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行政手段,严肃查处企业各类违法排污、违法用地、违法生产行为。同时,将喷水织机行业整治提升纳入乡镇年度、季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通过月晒季办形式加快推动转型升级,领导小组办公室健全完善督查考核机制,每月对重点乡镇(开发区)工作情况进行督查考核,实时通报进展情况。其次是建立激励机制。2022年,南浔区出台《喷水织机行业整治提升实施方案》明确,打造特色喷水织机园区的乡镇

(开发区),按时完成关停淘汰和整治提升的企业可享受相应的土地政策、技改政策、升规政策。共富园区成立之前,新利公司作为一家纺织企业,亩均税收30万元左右,每年用电量约为70—80万度,已达用能指标规定上限。为保障企业发展权益,同时发挥企业致富带动作用,南浔区大力创新共富园区机制,将新利公司用能指标纳入园区用能指标体系,通过整合多家企业用能指标,保障优质企业用能,成功化解该项难题。

“龙头企业+产业链农户”的经营模式能够实现政府、企业、农户三方的合作共赢。对于政府来说,园区化建设实现了基础设施的统一配备和污染排放的统一处理,既节约了用地指标,又提升了环境质量,实现了绿色安全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企业来说,可以通过整合农户的生产资源提质增效,拓展市场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实现低成本高质量发展。对于农户来说,能够稳住就业,只需专注于订单生产,可以节约大量生产资金、市场开拓、产品开发等成本,提升生产效率,收入能够增长15%—30%。“龙头企业+产业链农户”的模式,真正实现了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百姓得利,为浙江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提供了实践经验。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

重要窗口

理论周刊·知行